

人民生活日新月异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60 年,对于奔流不息的钱塘江来说,的确只能是短暂一瞬。然而,解放后的 60 年,对于浙江人民的生活来说,却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

1949 年,全省生产总值仅有 15 亿元,2008 年达 2148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272 倍;人均 GDP 由 1949 年的 72 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42214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100 倍。在全国 1%的土地上,浙江创造了全国 7%的生产总值!

浙江地狭山多。过去人们戏言:“汽车跳,浙江到。”行路难,可见一斑。而今,浙江拥有完善的交通网络:公路通车里程由 2197 公里增至 10.37 万公里,铁路营运里程由 1949 年的 390 公里增至 2008 年的 1306 公里。宁波一舟山港成世界级大港,民用航空通航城市已达 188 个。

60 年,浙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工厂”。2008 年,全省工业增加值达 1036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52 年增长 1045 倍;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比例由 1949 年的 68.5:8:23.5,转变为 2008 年的 5.1:53.9:41,完成了从落后农业社会向先进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跃变。

60 年,浙江不再是那个闭塞的山区省份,与世界靠得越来越紧:1952 年,全省外贸出口收购总值仅 1.2 亿元;2008 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 2111 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由 1958 年的 0.17 亿美元增加到 1543 亿美元……

罗列这些数字可能稍显枯燥,对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来说,从日常生活中能更真切地体会到这种变化:浙江人在全国住得最宽敞:浙江每户拥有汽车量居全国之冠……

浙江,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人民生活最富裕的省份之一。

社会保障日益完善

如果说老百姓是通过柴米油盐感受到了浙江的变化,那学者们则是通过浙江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感



受到了浙江社会的进步。

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曾这样评价:浙江是我国民生问题解决得最好的省份之一。

1996 年起,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覆盖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1 年,浙江在全国率先颁布《最低生活保障办法》;2003 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城乡统筹就业试点工作标准(试行)》;2006 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免除所有农业税……

截至 2009 年 6 月末,浙江企业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已分别达 1355 万、1122 万、1254 万、744 万和 709 万人,389 万城镇居民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512 万和 428 万农民工参加了工伤和基本医疗保险,362 万名被征地农民参加了社会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合率达 90%。这些数据,均列全国前茅。

“让城乡共享发展成果”,这是浙江完善社会保障、改善民生的又一手笔。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乡村康庄工程、“万里清水河道整治”工程、“农民健康”工程等一系列统筹城乡的惠民工程,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新农村、新农合、新农保、新农居、新社区……浙江农村,处处诗情画意。

创新动力永无止境

“七山两水一分田”。空间的逼仄,资源的不足,促使浙江人在经营机制方面率先创新;浙江最早允许农民工经商,浙江最早允许农民长途贩运,浙江最早允许对农民开放城乡市场……

“最早”,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等许许多多的“第一”,在义乌人“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中、在温州修鞋匠走街串巷的橐囊脚步声

中,悄然诞生。

从鼓励社队企业、家庭工业发展开始,浙江率先推进乡镇企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放权松绑的政策。2007 年,全省乡镇企业达 111 万家,实现增加值 8645 亿元。万向、传化……当年的农民,创办了一大批今天耳熟能详的大企业。面对民间的创业创新热情,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市场取向,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率先推进农村工业化、率先推进内外开放联动,率先推进城乡区域统筹发展……

浙江,已名副其实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体制机制最灵活的经济大省。

脚步没有停止,创新的活动也不曾停歇。去年以来,尽管金融危机寒流滚滚,浙江人在困境中更注重机制创新:2009 年 8 月 1 日,浙江率先

全国推出“扩权强县”省级政府规章——《浙江省加强县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若干规定》。443 项审批权限一次性下放。

与此同时,干部考核体系也在改革——“淡化”GDP,改变唯经济是考,让干部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民生。

“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四千精神”,这是浙江人力求创新的真实写照。

“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新四千精神”,使浙江人把创新推向了一个新的极致。

“平安”奠定千秋基业

安全是人的基本需求,安居乐业是人民群众世世代代的普遍愿望。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人均 GDP 达到 1000—3000 美元期间,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是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阶段,也是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的时期。

而在浙江,尽管人均 GDP 已率先接近 3000 美元,但浙江人并没有安全的压力。个中原因,与全力推进“平安浙江”有关。

新时期,浙江省委、省政府与时俱进,提出了新的施政目标: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公共安全融为一个有机整

体全面推进,让平安融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建设“平安浙江”的基础。5 年来,全省不断加大改善民生投入力度,2008 年新增财力的 2/3 用于了改善民生;5 年中,全省共搬迁 120 万山区贫困群众实行易地扶贫。政府还全力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缓解分配差距。九年制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已接近 100%,在全国名列前茅。

打造“平安浙江”,既需要“硬件支撑”,也需要“软件维护”。省委、省政府一方面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以乡镇综治工作中心为平台,推进平安工作网络向基层延伸,让综治进村居、进社区、进民企;另一方面,强化宣传教育——通过提高群众素质,让群众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自己化解矛盾,从而使群众情绪得到有效疏导,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积“小安”,必能成“大安”。不久前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浙江省群众安全感满意率居全国前列,省会杭州连续三次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桂冠。

(上图:钱江潮涌。吴国方摄)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王慧敏、袁亚平、江南、顾春采写。

直抒胸臆

历史档案:

1949 年 10 月 23 日晚上,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的 250 多名居民,代表辖区的 2250 户居民,投票选举产生了 17 名居民委员会委员,成立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经国家民政部正式确认,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成立的居民委员会。

人物抒怀:

陈福林 曾任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主任

“我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在解放前是拉黄包车的,解放初是浙江省实业厅棉种保管委员会下属杭州棉种翻晒组的组长。当时民主选举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委员,我得的票数最高,当选了上羊市街居委会主任。

过去的保长和甲长都是上面指定的,没想到解放后,自己能够通过公开选举当选主任,管 2000 多户!我一双大脚板跑天下,人缘好,工友和群众觉得我忠厚,也敢讲话,他们就选我。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就这样诞生了。人民选举产生居委会,居委会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这正是新的社会基层组织与保甲制的根本区别。

做事当认真,不管是领导交付的任务,还是居民提出的要求,我们都努力去做。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从 1949 年 10 月建立以来,中间有过变动,2008 年 7 月居民通过听证会表决,恢复‘上羊市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现在年代不同了,社区工作手段进步了,但为老百姓服务的目的还是一样的。”

历史档案: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个体工商户在浙江温州诞生。

1980 年 12 月 11 日,19 岁的章华妹领取到温州市鼓楼工商所发出的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 10101 号。这一年,温州 1844 位个体户营业执照的领取者,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个体户。

人物抒怀:

章华妹 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中领者

“第一次做生意的时候我十七八岁,说是做生意,其实也就是摆个小小的地摊,卖点日用品,像针头线脑、橡皮筋之类。那时家里兄弟姊妹七八个,父母赚的钱加在一起,也不够我们开支。当时工作都是分配的,我是家里最小的那个,分配工作根本轮不到我,只有去做生意。

当时最有地位的是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的正式员工,朋友、同学知道我要做生意,都觉得害臊。甚至我走在路上,都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瞧,他们家是摆摊儿的,没出息!’

后来,刚刚成立的温州市鼓楼工商所派人来宣传,说今后做生意合法了,可以去领一张营业执照。1979 年底,我交了申请表格。一年后,收到工商所的通知:营业执照办出了。

2004 年我才知道,这张营业执照是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我特意复印了一份,挂在自己店里,当作金字招牌。

经商 30 年,什么状况都经历过,说赚了很多谈不上,但我现在能买房、买车,比 30 年前过得好得多。再把生意做好一些,我就很满足了。”

见证中国农民的生活变迁

徐永辉

1950 年初春,我刚当浙江日报记者,第一次下乡,拿着社长陈冰交给的一台老式的折叠式照相机,来到嘉兴县农村采访。路过七星乡二村村口时,忽然听到一阵欢快的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循声一看,原来是两个穿着破烂的孩子,在晒场上蹦蹦跳跳地唱歌。我走近细看,两个孩子穿的居然是用破布旧絮拼合而成的衣服,腰间还扎一根绳子,以防掉落。

我心中一动,要把旧社会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记录下来。这时,孩子的父母从破屋里出来,我就提议给他们拍一张“全家福”。在拍摄中,我才知道这一家的主人叫叶根土,是雇农,妻子叫高阿二,一女两子名为桂凤、

兴富、兴友。

从此以后,我跟踪拍摄叶根土一家。《一户人家十年间》,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为照片拟了标题,配上诗。1962 年 9 月 5 日,我带着《一户人家十年间》照片作为礼物,参加叶根土女儿的婚礼。叶根土连声说:“这是我家的宝哇,用钞票也买不到!”

女儿出嫁那天,叶根土把这组照片作为最珍贵的陪嫁品,嘱咐她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党的恩情。

这感人肺腑的新事,让我深为感动,就抓拍了一组照片。《陪嫁的“传家宝”》在浙江日报发表后,人们争相传阅,成了轰动全省农村的大新闻。人民日报等报刊纷纷转载,并配发评论。后来,《陪嫁的“传家宝”》这幅照片,作为翻身农民的历史见证,被中国人民革

命历史博物馆收藏。

《一曲难忘 30 年》、《历史的一页》、《一户人家 40 年》、《女主人》、《兴友走上致富路》、《一户农家 60 年》、《幸福花儿朵朵开》……

我对这户人家跟踪采访 200 多次,积累了大量资料,已经完成了叶根土三代人的报道。最近,我又开始报道叶根土的第四代曾孙女考进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景。

60 年,我用手中的镜头真实地记录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农民的生活变迁。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经历解放、改革开放,奔向小康生活,这正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前进步伐!



图①:当年少吃少穿,如今其乐融融。

图②:解放初期,叶根土一家合影。

图③:新老住房的巨变,让叶桂凤(中)欣喜不已。

图④:叶桂凤住过的破房屋。

